

孙建军说,关键是有些资料,明知其有,却看不到,比如,罗丰禄长期担任北洋海军营务处道员,属于李鸿章身边之人,但是“罗丰禄家书”却如神龙见首不见尾,百索不得。甲午战争结束后,姚锡光立即着手撰写《东方兵事纪略》一书,这位前天津武备学堂教习,曾向他的那些曾担任各战地陆军中下级军官的学生,询问战事的细节。这些学生回复老师的书信,其下落也成了令人神往的谜团。

因此,孙建军将研究过程中发现的北洋海军官兵回忆史料进行了整理,就是这本《北洋海军官兵回忆辑录》。

书中包含了这样几个部分:“北洋海军军官禀帖”,转录自陈旭麓等编纂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《中日甲午战争》(下),该书早在1982年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这些呈文,根据时间来看,应是当时北洋大臣王文韶下令征集的,故呈文分为“海军失利缘由”和“重整海军要略”两个部分,这可以从张哲深呈文中看出。从这些禀帖来看,大多谈前者少,而谈后者多,敢言与不敢言,因人情而异,但避丑扬善亦属人之常情。

孙建军说,这些“禀帖”是否全部?亦不可知。为何那些被日军遣返的舰长们无一发言存世?今已不可考。

“平远”舰三副林韵珂的报告,分为甲午、甲申两个部分。系池中祐在民国海军部负责编纂海军史时征集的,目前仅见此一份,转录自1997年台湾出版的《海军官校五十年》一书。孙建军认为,这不应该是全部,当时参加过甲午海战的北洋舰队军官健在的很多,相信池中祐都会向他们函询,难道其他人的“报告”均已泥牛入海了?实在令人不解。

《萨上将军会见记》一文,出自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作者田汉先生于1941年的采访,刊于1941年4月15日的《海军建设》第2卷第1期。因本文中有萨镇冰对丁汝昌、刘步蟾、林泰曾、杨用霖等人的评价,乃萨镇冰唯一的一次发言,弥足珍贵。

“北洋舰队水兵回忆”部分,全部出自老一輩甲午史学者戚其章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调查。戚其章先生于1981年出版《北洋舰队》一书,曾选录4篇公开,而后又全部发表在威海《甲午战争在威海》(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)一书中。孙建军说,水兵因所处的地位和见识,其回忆中不确的地方,不必苛求,若与其他资料参照使用,仍不失其重要的价值。

书中最重要的一份资料为广甲舰管轮卢毓英的手稿,是自发现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全文公开。该手稿是1960年由福建师大图书馆在福州街头的旧书摊上购得,原为纸钉装订,共29张58页,3万余字,毛边纸稿本,不著撰者,未有题名,时任福建师大图书馆馆长金云铭先生根据内容拟定题目为《卢氏甲午前后杂记》。

同属该校的历史系教授陈恩寿,考证认为该手稿为甲午战争时担任广甲舰管轮的卢毓英亲笔所撰。

1988年《福建大学学报》第二期刊登了陈恩寿等人的文章《方伯谦案新探》文中首次使用了卢氏手稿中的记述。此后这份材料开始受到国内甲午史学界的关注。

该手稿,叙述了卢氏自年少入马尾船政学堂至离开海军的经历。其中,卢氏参加甲午大东沟海战、刘公岛保卫战的经历最为关键。孙建军说,大东沟海战部分当然非常重要,但其他部分仍有存史的价值。故将全文点读,并根据内容代拟题《卢毓英海军生涯忆旧》。

《卢毓英海军生涯忆旧》共三万余字。在手稿中,卢毓英记述了大量的战争细节,这些文字如今为解读那场战争提供了第一视角。

比如关于邓世昌、刘步蟾等多位北洋海军的管带、将领以身殉国时的情景,都进行了记录。

同时,卢毓英的记述,也是破解北洋海军人事关系谜团的一把钥匙,虽然很多都是点到为止,但名单背后却隐含着诸多历史信息。因为卢毓英在手稿中对方伯谦颇具同情之语,史学界对此也有争论。

孙建军说,点读过程中,只做简单的技术性注释,以保持原作原貌,不代读者作判断。

近代史学者姜鸣说,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胜负原因和教训,除了对比双方的装备、作战状态之外,其实也应该关注这种细节的演变,关注海军官兵训练、生活和精神状态。总体而言,甲午战后中国官兵直接撰写的回忆史料少之又少,这本《北洋海军官兵回忆辑录》,将海军官兵的各种战后回忆汇集一册,提供了中国军人战时观察的视角,是个很好的创意。

孙建军说,这是目前能够收集到的甲午海战之后北洋海军将士的全部发言,“我们希望这是全部,又希望不是;前者可以方便研究者,后者则寄望于更多回忆资料继续浮出水面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王国平 图由受访者提供



孙建军整理校注的《丁汝昌集》。



孙建军整理校注的《北洋海军官兵回忆辑录》。

《北洋海军官兵回忆辑录》

孙建军说,研究历史,第一手资料也就是当事人的记录和回忆尤为可贵。对于发生在中日间的这场甲午战争来说,日本方面的记录相当的丰富、详实。但是,日本人再洋实的记录,也只是历史现场的一个侧面。要走近历史的真相,全面观察那场战争,还需要双方资料相互参照。很遗憾,我们中国人留下的资料太少了!特别是甲午战争中中国参战将士的记录,几近于无。

如学者马幼垣先生即曾话:“更严重的缺漏还是在于主持海军人士个人抱持明哲保身之训,以为笔下愈少留记录就愈享后世高誉”。这是研究者的迫切与无奈。

1 全面收录

汇编最全的《丁汝昌集》

“全面整理公布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书信、电报,深度透视亚洲第一舰队的管理、用人、训练、后勤、作战行动细节。”甲午史学者孙建军整理校注的《丁汝昌集》中,收录电文、函稿近千件,共60余万字,是目前关于丁汝昌最全的一本文集汇编,几乎“穷尽”所能见到的史料。

孙建军说,丁汝昌的一生,与北洋海军密不可分。他服役北洋海军期间,留下不少的函稿、电报等,对于研究北洋海军和甲午战争,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。但因为散佚、毁灭严重,收集、整理丁汝昌资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这本《丁汝昌集》的资料正是来源于孙建军十几年的精心收集和整理,其中部分文稿是从日本回译后首次披露。孙建军说,史学界对丁汝昌的研究,可以说是不够深入的,与其北洋海军提督的位置是不相称的。研究北洋海军和甲午战争,应以丁汝昌研究为切入点,在他看来,这或可称为“牵牛鼻子”和“解剖麻雀”。

但做起来并不容易,资料不足。

孙建军认为,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。因此从一开始,他就注重对原始史料的搜集和整理。

如今这部《丁汝昌集》,分为六卷:

卷一为《往来要信底簿》,时间自光绪十年至光绪二十年止,是丁汝昌统率北洋舰船期间公私信函的抄录件,出自

完成一本“丁汝昌全集”,是孙建军长期以来的心愿和期待。但孙建军认为,丁汝昌的有关资料,究竟还有多少尚未被挖掘出来,很难说。因此,在选用书名的时候,最终舍弃了“丁汝昌全集”,而与出版社商定,采用了《丁汝昌集》。

孙建军说,关于丁汝昌的资料,肯定尚有未见史料等待挖掘。

比如,1894年6月5日,从丁汝昌给李鸿章幕僚于式枚的信中可见,当时一些公文是按照国家档案管理的规定进行回收的,这些信肯定是要存底的。

此外,还有来自海外的丁汝昌史料,如日本人当年战场缴获的大量文书,是一个重要的部分。在本书中,1894年的一些“丁汝昌谕令”就是来源日本的存档,原文已翻译为日文,本次进行了回译;还有一封1884年7月15日丁汝昌致时任朝鲜交涉通商事务部衙门督办公允植的信,

原件藏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库,为辽宁大学权赫秀先生发现,此次也一并收入;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还存有“李鸿章办理海军来往电文”。

还有一个渠道是台湾,比如1910年4月25日筹办海军大臣裁询为丁汝昌“平反”的折子,就是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复制回来的。

孙建军说,这些文稿,显然不可能是丁汝昌电文的全部。

通过整理丁汝昌史料,孙建军认为丁汝昌是个悲剧性的人物,他在历史的大潮中沉浮,完全没有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,有些事是他力所不能及的,他办不了的事情,整个国家也是办不了的。

孙建军坚信一个观点,基础资料错了,是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;即使结论侥幸正确,也不能反过来证明证据就必然是正确的;北洋舰队最终的失败,也不能反证它的过程就必然错误。



藏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“李鸿章办理海军来往电文”,其中就有丁汝昌的电报。



1881年率领官兵赴英国接受超勇和扬威舰期间,丁汝昌在英国纽卡斯尔的明德尔松照相馆拍摄的照片。



孙建军。



1881年英国报纸刊登的铜版画,表现丁汝昌在英国期间参观英国皇家海军养病院时的情景。

北洋海军官兵的甲午海战亲历

甲午传信

甲午 女评

120多年前的甲午战争中,在北洋舰队对日本——威海保卫战前夕,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预感恶战在即,命人将北洋海军的文书记档案移送天津北洋大臣衙门,然而这批档案在1900年庚子劫难中,几乎荡然无存。

有关这场海战,这支军队的大量细节,因此都处于缺失和似是而非的模糊状态。因为战败,甲午战后,生还的北洋海军当事人,虽然几乎都选择了缄默,但总有只言片语或是信函文档流散各处。数年来,甲午史学者孙建军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,将搜集到的相关资料细心整理,结集出版为两部图书《丁汝昌集》和《北洋海军官兵回忆辑录》(以下简称《回忆录》)。

通过这两部书可以一窥北洋海军内部的运作和反思。《丁汝昌集》是丁汝昌自尽前,也是北洋海军覆没前,对这位海军司令留下的电报、手稿等档案资料的“穷尽”搜集。《回忆录》则是对在甲午战后北洋官兵回忆文字的一次彻底整理。



更多甲午书评,扫码上封面新闻看短视频。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新闻资讯